吳戈

順勢而為：新聯公會功能拓展與全菲佈局

吳戈談僑

一個社團生命力最終體現在活動。《特刊》顯示，新聯會務功能可歸納為政治、經濟、文化三個面向，這三個面向並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支撐、互為表裡；2011年後組織擴容、2012年分會成立，又使新聯從馬尼拉走向全菲。政治功能的延續與調適最引人注目。

創建初期，新聯明確為「愛國團體」，推動中國和平統一。2002年以前，它長期作為菲華各界聯合會籌委會成員和常設秘書處，在歡迎中國領導人、慶祝國慶、反對「台獨」等活動中「擔負了重要的工作」。

這一基因未淡化，而是尋找新表達。公會與歷任中國駐菲大使、參贊保持制度化互訪，如歡送劉建超大使、迎接馬克卿大使、為參贊離任餞行。

這些外交往來是維持與中國官方聯繫的紐帶，也是在華社保持影響力和合法性的資源通道。

經濟功能凸顯於21世紀。早期如1988年邀請晉江縣經濟考察團訪菲，尚屬零星牽線。

2009年後，新聯連續四年參加第六至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團組從數十人增至百餘人，從觀展發展到參加商會領袖論壇演講、與各地工商聯締結友好、考察北部灣。

行程包括南寧國際會展中心、北海港口、欽州保稅港區，甚至赴越南考察下龍灣旅遊和邊貿。

林金山提到，公會與廣西、江西、雲南工商聯及泰國華人青年商會、浙江金華泉州商會等締結友好。經貿成為橋樑，連接桑梓情懷與實際利益。

文化功能呈現從「向外展示」到「向內扎根」再到「代際傳承」的軌跡。20世紀80年代偏對外傳播：1982年「融合八二」歌舞晚會，1984年四號電視台「今日中國」，1985年「友誼花盛開」。受眾首先是菲律賓主流社會。

20世紀90年代尤其2000年後轉向華社內部：美術社、民樂團、新春燈謎，豐富會員生活，增強凝聚力。

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自20世紀80年代組織、2000年代固定，讓華裔新生代回祖籍國「親身體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從福建到廣西、泉州到昆明，合作方從地方僑辦擴展到國務院僑辦和華文學校，運作日益成熟。

2011年增設婦女組、青年組是總部內部擴容；2012年則是空間突破。中呂宋、碧瑤市、將軍市分會相繼成立，加上宿務、納卯、怡朗、加牙鄢籌委會，覆蓋全菲主要城市的網絡初具雛形。動因是「適應時代潮流和社會發展需要」「響應各區域不同層次人士要求」「擴大陣容，壯大影響力」。這反映領導層認知：華人已遍佈全菲，若僅限首都，就無法代表更廣泛菲華群體。

分會成立呈自上而下推動與在地精英響應結合。中呂宋分會首任會長李炳南稱，分會在王書侯等支持下「應運而建立」。

碧瑤分會經總會領導王書侯、林金山等十人專程拜訪、座談，「認真醞釀」，選出張遠飛、謝自來為籌委會正副主任。將軍市分會亦由總會赴棉蘭佬島與陳瑞林等籌備。

成立儀式有總會站台、中國領事館官員出席、菲政要祝賀，既確認合法性，也宣告華人社團存在與力量。

網絡化意義重大：資源動員上，募捐、救災、義診覆蓋更廣，2012年呂宋水災中中呂宋分會增強賑災在地效能；政治影響上，分會提供基層觸角，強化與地方政府交往基礎。

組織韌性上，多中心網絡比單中心層級更能抵禦風險，各分會可獨立運作，維持整體生命力。新聯公會40餘年是一部社團適應性成長史。

組織形態從常務制、理事長制到會長制加分會網絡；領導機制嘗試權力共享、集中領導、擴張賦能；功能從政治表態、文化展演拓展為政治、經濟、文化三足鼎立。

這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對中菲關係深化、中國經濟崛起、區域一體化的敏銳回應。

中國—東盟自貿區2010年建成時，新聯已編織經貿網絡；僑務部門重視新生代時，「尋根之旅」已運作多年；菲華社會面臨代際更替時，婦女組、青年組提供人力儲備。這種「順勢而為」，正是新聯脫穎而出的核心密碼。當然，規模擴張與凝聚力、菲華青年認同、「一帶一路」下跨國社團新角色等問題，仍待下一個十年特刊續寫。

胡濟衛

揭開菲律賓「玉通戰役」的敘事秘密

特稿

2026年10月31日，菲律賓前駐巴基斯坦大使傑米·揚寶在《馬尼拉時報》發表專欄文章，搬出七十多年前朝鮮戰場上一場營級戰鬥，聲稱「900名菲律賓士兵擊敗了4萬中國人民志願軍」，並以此警告中國「不要輕視菲律賓」。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回應直截了當：「一派胡言」「經不起任何歷史檔案核驗」。

一個退休外交官在主流媒體上把一段被反覆加工的歷史當作外交論據，這件事本身並不值得從軍事層面認真對待。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這套敘事為什麼在2026年10月被重新拿出來，它究竟服務於什麼？

事實層面並不複雜。 玉通戰鬥發生於1951年4月22日至23日，是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中一場小規模戰術戰鬥。菲方參戰的是配屬美軍第3步兵師序列的第10營級戰鬥隊，約900人；與之交手的並非「4萬志願軍」，而是志願軍第44師132團以2營為主力的團級規模兵力。戰鬥結果是菲軍營級單位被圍殲，志願軍殲敵335人、俘虜3人。揚寶引用的那句「麥克阿瑟名言」同樣經不起核對：麥克阿瑟在戰鬥爆發前11天已被杜魯門撤職，美方史料中找不到他在玉通戰鬥後說過這句話的任何原始記錄，最早的菲方版本是「給我1萬名菲律賓士兵」，傳到揚寶筆下縮水成了「幾名」。

一個被圍殲的戰例，如何在菲律賓主流話語中翻轉成「以少勝多解救美軍」的傳奇，本身就是一條值得審視的敘事生產鏈。「900對4萬」的說法大約在2017年前後開始獲得官方色彩：菲律賓退伍軍人事務辦公室在

紀念玉通戰役66週年的刊物上，將網絡傳言以「900名菲軍士兵堅守陣地」的形式納入官方敘事；2018年《馬尼拉公報》刊登的歷史學家文章在此基礎上加上了「擊退4萬中國士兵」的表述；此後前總統拉莫斯在公開場合反覆引用，數字在傳播中不斷膨脹，傷亡數字在不同版本之間甚至互相矛盾。到了2026年，同一個敘事已經在TikTok、Reddit等平台上以迷因形式流轉了兩年多，出現了動漫剪輯版本和「兄弟別忘了玉通」的固定句式，最終被一位前大使從社交媒體評論區搬進了報紙專欄，完成了從玩笑到「論據」的升級。

這套敘事的首要功能不在對外威懾，在國內動員。 2026年下半年的菲律賓，馬科斯政府正面臨嚴峻的合法性壓力：社會氣象站7月民調顯示其淨信任率降至-11，首次獲得「差」的評級；亞洲脈搏的調查顯示半數民眾不滿意其執政表現，抗議者批評政府未能有效應對生活成本飆升、腐敗和治理不力。當國內治理績效難以提供政治資源時，一個可重複調用的歷史心理錨點就變得格外有用。「玉通敘事」提供的正是這樣一個錨點：一個曾經被殖民、軍事上長期依附於美國的國家，在歷史中找到了一場可以被稱為「以弱勝強」的戰鬥，而且這場戰鬥恰好是對著中國打的。它的功能不是說服北京，而是讓菲律賓國內受眾在每一次海上摩擦之後，都能找到一個「我們曾經做到過」的情緒出口。

然而這套敘事在政策操作層面暴露了一個它自己無法彌合的結構性矛盾。如果菲律賓軍隊的歷史傳統真的足以在「900對4萬」的條件下取勝，那麼馬尼拉在現實海上摩擦中的行為邏輯就應該更接近「獨立應對」，而不是反覆援引一份1951年的條約來為每一次補給和巡邏提供背書。揚寶文章的論證順序本身就透露了底牌：他先把中國「至今沒動菲律賓」歸因於《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威懾，然後才搬出玉通戰役作為補充性的歷史證明。這意味著，在一個前大使面向主流媒體的政策寫作中，同盟威懾是第一位的，歷史戰績是第二位的。社交媒體上被講述成「獨立戰力證明」的玉通神話，在真正的政策判斷中退回到了同盟框架的從屬位置。這種位置差異說明，真正在做判斷的人清楚歷史敘事的份量邊界：它可以在國內政治中流通，但不足以替代同盟條款在現實威懾結構中的功能。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這種敘事依賴正在塑造一種路徑依賴：用歷史來填補現實手段的不足，再用同盟來填補歷史敘事的可信度缺口。菲律賓國防部長在仁愛礁補給問題上公開表示中方行動「可能觸發《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但同時說明是否援引條約最終由總統決定。這種表述的結構是用條約的存在抬高對方行動的成本預期，同時為自己保留不自動激活條約的裁量空間。條約在這裡的主要功能不是作戰承諾，而是政治槓桿。而當歷史敘事被用來否認現實力量對比的當下意義時，否認本身並不會改變事實：玉通戰鬥的真實結果是一個營級單位在不到十二小時內被圍殲；當下南海摩擦的真實結果是菲律賓的每一次補給行動都需要在外交和輿論層面進行大量的預先鋪墊和事後解釋。

玉通戰役真正的教訓，不在「900」和「4萬」之間。一支配屬美軍、得到重炮和坦克支援的營級部隊，在志願軍進攻面前防線被迅速擊穿——這才是1951年4月22日夜裡發生的事。菲方敘事把這個過程抹掉，換上「解救美軍營」的橋段，等於把一次戰術失敗包裝成獨立作戰的證明。一個國家的軍事記憶如果只剩下這種包裝，下一代從裡面學不到任何關於真實戰場的東西，學到的只是如何在話語上「贏」。敘事可以通脹，但水密隔艙不會讀《馬尼拉時報》。

莊杰森

AI 時代、第二語言學習的挑戰

——從親身見聞淺析華文教育的興起與衰敗（之廿）

各說各話

隨著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快速發展，文字翻譯、語音辨識與即時口譯日益便利。使用者只須輕觸螢幕，便能取得譯文，甚至直接以語音與使用不同語言的人交談。這樣的改變，也使語言教育面臨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既然機器可以協助溝通，為何還要花費多年時間，學習第二種，甚至第三種語言？

對菲律賓華文學校而言，這已是需要及早因應、未雨綢繆的課題。倘若家長與學生認為，華文的實用功能可以交由翻譯工具代勞，原本已不易維持的學習動機，恐將受到進一步衝擊。

然而，AI可使跨語言溝通更加容易，是否就意味著學習語言不再重要？華校又應如何調整課程與教學，使下一代在科技快速變動的環境中，仍然願意學習華文，並從中獲得實質助益？

正視科技、重思學習價值

面對這股趨勢，華文教育界若仍以「AI只能翻譯字面意思，無法處理情感與文化」作為主要回應，恐怕不足以令人信服。現有工具已能處理部分語言要表達的意思，但成語及語氣差異表現仍有不足，尚未達到精準轉換。

人工智慧持續進步，今日尚未達到完善。因此，現今的華文教育亦不能只建立在依靠AI機器之上。

我們更應細思，翻譯工具可以協助理解一段文字，卻不等於使用者已具備自行閱讀、直接交談，以及辨別譯文是否妥當的能力。

當談話涉及委婉拒絕、幽默反諷、人情分寸或文化典故時，具備語言能力的人，往往能從對方的語氣、神情及談話情境中領會言外之意，遇有疑義也能適時確認，再斟酌措辭，作出得體的回應。

即使 AI 工具可提供流暢的文字譯文，但使用者若完全不懂原文所表達的意涵，又如何判斷其中是否有所遺漏、語氣是否合宜，或是否偏離使用者的本意？

善用科技、增添學習助力

人工智慧對語言教育的影響，既帶來挑戰，也開啟新的學習機會。運用得宜，可以增加練習機會，協助教師照顧程度不同的學生。

對缺乏華語使用環境的學生而言，AI可以提供課堂以外的對話練習。學生可模擬購物、問路、旅遊或日常交談，反覆練習運用，取得即時回饋。對於害怕說錯、不敢在同學面前開口的學生，這類練習也可能減輕心理壓力，增加嘗試表達的意願。

AI亦可依學生程度，協助調整文章難度、解釋生詞、提供例句，或針對寫作提出修改建議。

程度較弱的學生可以逐步補強基礎，程度較好的學生則可延伸閱讀與探討，讓學習更加豐富彈性。

對華文程度有限、難以協助子女課業的家長而言，適當的語音與文字輔助，也可能減少陪伴學習時的障礙，使孩子在課後遇到疑問時，多一條尋求解答的途徑。

教師同樣可以運用AI協助準備分級教材、設計情境對話及整理常見錯誤，將更多時間用於觀察學生、解答疑問或個別輔導。然而，這些便利能否轉化為學習成效，仍取決於教材是否適切、教師引導，以及學生參與練習的熱誠。

過度依賴、恐損自主表達

另一方面，當翻譯或答案垂手可得，學生也可能逐漸失去主動學習的耐心。遇到生詞便直接透過AI翻譯，尚未閱讀便先看摘要，還未嘗試組織句子，就請AI代為完成。久而久之，原本應透過反覆接觸、回想與運用建立的語言能力，便可能因為缺乏足夠自主練習，喪失獨立自主的學習動機。

尤其需要留意的是，能夠交出一篇流暢的作文，未必代表學生已具備相應的寫作能力；能夠藉助工具理解一篇文章，也未必代表離開工具後仍能自行閱讀。倘若學校只重視作業成果，忽略學生完成作業的過程，便容易錯估實際程度。

此外，AI提供的解釋與修改並非始終正確。有些表達雖然文法通順，卻未必符合特定場合的語氣、文化習慣或說話者的原意。基礎尚未穩固的學生，往往也較難辨別其中問題，甚至可能將不妥當的用法當成正確答案。

倘若練習長期侷限於與機器對話，也可能缺少真實交流中的磨合。與人交談，需要聆聽、等待、觀察反應、處理誤解，也需要顧及對方的感受。這些能力，仍應透過師生、同學及家人之間的實際互動持續培養。

即時翻譯的便利，更可能使學生認為「反正 AI機器都會翻譯」，因而降低學習意願。

面對這樣的疑問，學校必須透過具體的課程與生活經驗，讓學生看見親自掌握語言的價值。

調整教學、落實學以致用

然而，強調語言與文化的重要，也不能成為維持舊有教法的理由。

倘若學生多年所學，仍停留在背誦課文、模擬生詞與反覆練習考題上，離開課堂後卻依然難以開口交談、閱讀短文或自如表達想法，自然更容易引人質疑：這些學習成果是否實用，值得華教界長期的投入？

華校亦應重新檢視課程與評估，應依學生程度訂定清楚而可達成的目標，增加生活對話、實用閱讀、短文寫作及文化討論的空間，讓學生感受到「學以致用」的成就感。

例如，讓學生以華文介紹家人、敘述生活見聞、閱讀簡短資訊，或訪問長輩、記錄家族故事。程度較好的學生，則可進一步引用不同觀點、討論時事與閱讀作品，使語言能力隨著年齡與理解力逐步深化。

AI縱使可以參與其中，但課程必須保留學生獨立思考與表達的空間。較妥適的作法是先自行閱讀，再請AI解釋疑難；先嘗試寫作，再比較AI修改的建議；先完成對話練習，再檢視AI提供的用詞與表達。如此，AI工具才是成為學習助力，而非反客為主。

教師引導、培養判斷能力

AI進入課堂，也導致教師的專業要求隨之改變。除傳授語言知識，教師更須懂得選擇教材、明辨對錯、設定課程、並引導學生判斷AI工具提供的內容是否適切。

例如，學生使用AI修改文章後，教師可要求其說明修改理由；比較不同譯文時，則討論用詞、語氣與文化差異。透過這些過程，才能看出學生是否真正理解所學，而非照單全收，不明究　。

評估方式亦須相應調整。除書面作業，還應加入課堂即席表達、現場閱讀、口頭問答及寫作修改說明，並清楚區分可以使用AI工具與須獨立思考的界限，才能掌握學生的實際能力。

學校也應為教師提供適當培訓與共同探討的機會。教師若缺乏時間、資源與專業支援，恐怕難以要求其自行摸索新工具並形成有系統的教學改善。

傳承文化、連結生活體驗

對華裔家庭而言，華文也承載著傳承長上意志、理解家族故事、閱讀華文作品及參與文化生活的機會。透過自然的家庭學習，學生可以逐步體會某些稱謂、語氣與表達背後的人際關係，並從實際上不同的角度理解周遭人士的生活與思想。

然而，這些價值必須透過具體而有感的體驗中獲取呈現。倘若文化傳承只停留在大呼口號，實際上長期使學生不知運用自如而感到挫折，未能妥適引領學子，持續吸引學生熱情學習的意願更是緣木求魚，談何容易！

對華校的非華裔學生而言，華文則可以成為接觸另一種文化、拓展交往與學習機會的管道。學校應理解不同學生的背景與需要，適才適所地讓每個人都能找到與自己生活相關的學習理由。

AI時代的到來，迫使華文學校重新詮釋教育價值，也重新評估檢視教學成效。日新月異的新興科技所帶來的顯著效益，雖然助力不少，但不會因為引進AI工具便全盤替代學生的自主思考與判斷。過度依賴AI的負面影響，也需要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教師引導與評估制度加以檢討改善。

當AI 翻譯愈來愈風行，華文教育便更需要讓學生親身運用體會，不要錯認AI所侷限的片面之隅，使自己能全面地理解，運用自如地表達想法，以進入更寬廣的文化世界，才是華校今後理應努力培養學生的中庸之道！

（未完待續）